

★ 青年学者文库 ★

道学与佛教

周 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友文库★

道学与佛教

周 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学与佛教/周晋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ISBN 7-301-04211-8

I. 道… II. 周… III. 哲学-中国-古代-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25 号

书 名:道学与佛教

著作责任者:周 晋

责任编辑:贺 雷

标准书号:ISBN 7-301-04211-6/B. 0178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星星火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 开本 6.625 印张 162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199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序 言

周晋的《道学与佛教》汇集了他研究道学、佛教、道学与佛教关系的成果。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为《二程与佛教》，是作者曾撰写的学位论文。下篇则是作者就相关主题所撰写的其他论文。编者问序于我，我命其名为《道学与佛教》。而在内容上，此书无疑以《二程与佛教》为其骨干。

宋代道学的兴起，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开创了所谓“理学”的时代。两汉经学自武帝计则不足四百年，魏晋玄学自正始计未足二百年，隋唐佛学亦未及四百年。而宋明理学之延续，据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的提法，前后达七百年。理学自北宋发端，至清前期，大家如云，如潮如涌，其间虽然派别纷陈，理路各异，而其主流，无非新儒学也。

就宋代理学的历史来看，儒者中最有影响的，当推程伊川与朱子。伊川曾遭编管流放，后又列入党籍，朝廷且追毁其文字，复尽逐其学徒。朱子晚年遭庆元党禁，被作为“伪学之魁”而落职罢祠，死后学生尚有不来奔丧者。有明一朝，王阳明独出诸儒之表，而阳明生时即被目为伪学，死后并夺其爵、禁其学，实可叹也。然而，宋明理学竟成为七八百年间知识人的主流话语，此真不可不谓为奇迹也。此亦可见主流思想之力量，不以王朝兴衰为起伏，而以其精神之魅力为终始。

近代以来，研究理学史者，颇多其人。而宋代道学之兴起，又是一个人人觉其重要，而致力不多的题目，且有说服力之著作亦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此涉及理学发生之前史，史料庞杂，未易疏理；二涉及佛道二教，而佛道经籍汗牛充栋，经年不能穷其旨；三非

对理学之内在讨论有深入了解，决难辨察理学与佛道之真正关联。

就文化、学术、思想来看，宋代学术的勃兴与北宋前期的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关联。北宋开国后大兴文教。宋太祖开宝四年刻宋版《佛藏》，共五千四百八十卷。宋太宗时编《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真宗时编《册府元龟》一千卷。天禧三年《大宋天官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录成，是为道藏的先驱。仁宗时在汴京国子监刻石经，中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其中《孟子》入经，尤有意义。儒家经典的疏义也纷纷涌现。仁宗天圣五年御赐新及第进士以《中庸》，八年赐《大学》，此后不断。庆历时代解经风气一新，推尊孟子、韩愈，士大夫以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为己任，学术思潮丕然一变。仁宗庆历四年，令天下州县立学校。这一时期书院也开始发展起来。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北宋前期的文化繁荣，讲学和著述的风气一时盛行，为道学的出现造就了基础。

然而，所有上述事实，只能说明宋代儒学复兴的理由，却并不能说明“道学”这种特定形态的新儒学产生之必然性。要说明“道学”出现、发生的缘由，就不仅要一般地说明宋代儒学复兴的起因，更要能够说明“道学”形成的诸条件。这就需要在观照历史的外在条件的同时，深入思想活动本身来加以研究。

用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术语来说，二程乃开创了一套后来居然主宰数百年知识人精神生活的话语系统，建立起一新的思想范式，并被学术思想历史所选择。此一话语究竟何以建立，此一范式究竟如何得以成立，乃是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大课题，需要多方面、多时段的工作相配合，但道学与佛教的关系，不能不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本书的思路是以北宋道学的兴起为对佛教思想对中国影响所作的反应。如果把佛教的张扬看作是对儒家文化的挑战，则道学在

起因、在内容上都可看作是对佛教此种挑战的回应。这种“佛教挑战—儒家回应”的模式，在思想史学界并非晚近新出的提法。而周晋此书的特色乃在于，他在研究上真能鞭辟入里，深造有得。周晋选择“二程与佛教”作为论述主题，自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没有二程的洛学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影响，北宋五子的提法就根本不能出现；周敦颐为二程的老师，张载为二程的学友，邵雍亦二程在洛的学侣，北宋五子周张邵二程，二程实为中心。按洛学在两宋之际仍为禁学，但慕之者不乏其人。如朱子少师刘白水、胡籍溪，白水年轻时在太学即“阴访伊洛程氏之传，得其书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使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潜抄以默诵之。”（《聘士刘公墓表》，《朱子文集》卷九十）籍溪亦然，“始闻河南程氏之说，寻以乡贡入太学，会元佑学有禁，乃独与乡人白水刘君致中，阴诵而窃讲焉。”（《籍溪胡先生行状》，《朱子文集》卷九十七）洛学在禁中仍然流行，有心人与有功焉。有洛学之流行，濂溪、横渠之影响始能建立。有道南（龟山）、湖南（五峰）之学宗继伊洛，才有朱子的出现。故若无二程，即无朱子，若无二程，即无两宋道学，可以说，二程实为两宋道学史的最重要的人物。

因此之故，二程与佛教的关联，二程对佛教的批判继承，最能说明道学兴起与佛教的因缘。而二程对佛教的态度，对儒佛之辨的判语，对后世理学的影响亦甚大。此不独因二程个人之影响，复由朱子服膺二程之学，而后来儒者每以朱子为轨范，而有以致之。伊川作明道行状，中说：“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这句话更几乎成为宋明士大夫常规的思想历程。道学与佛老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道学的发生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别研究，然后统合为一完整的图象。可从制度方面研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等；也可从文化方面研究，如经学史、易学史、文化史、哲学史等。周晋此书的取径是哲学史，即注重概念、义理、思想的传接变化关系。

此种取径可称为“内在的”，与注重了解道学对应北宋社会时代问题的“外在的”取径不同。与以往一般的哲学史论述不同，作者是在大量阅读佛典、深入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从八个方面详细分析二程代表的道学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理论、教法、功夫的复杂关系。作者在大的方向上采取两个原则，一个是正面揭示儒家批评佛教的理论前提和价值立场，一个是深究二程在心性哲学方面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这需要对佛典和佛学讨论的相对熟悉、和对理学讨论的内在了解。在本书所处理的这个题目上，我认为周晋的研究，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的佼佼者。他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和他能遍问学于本系诸先生而精思力学分不开的。他的文字论述，据我观察，颇师法于钱宾四先生。这也可见他学问的志向高远，而非限于一家一门者也。

周晋离去已近一年。他的笑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的离去，家人最为悲痛，这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我不仅为他的个人才华，为我们的师生情谊而深感痛惜，我真正地为广大哲学系，为我们中国哲学教研室失去这一位可能的同事、失去一位德才兼备的后继者而痛感惋惜。周晋生长于燕园，曾以绝优成绩而选择入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即赴美留学，一年后断然返回北大，以全系第一名成绩考取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后又考取博士研究生，一心以研究发扬中国哲学为己任。这样素质的年轻学人在今天实在是太少了。我常常想，在这个时代，聪明好学之士并不少见，但论性情德行上的修养，就往往无从说起了。周晋之难得，是因其生具聪慧过人的才质，在学问上能用勇猛精进的功夫，而始终对世俗功利抱一恬淡之心。这样富于才华又进德修业的学人，居今之世，岂易得乎哉！在中国历史上，“不幸短命”的青年哲人并不罕见，远的不说，明代青年哲学家徐爱，字曰仁，悟性德性兼优，曾梦一老僧抚其背说，“汝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后来竟然应验了，三十而卒。周晋

才情德智，堪与徐爱相比，却未及三十而卒。天不能如人之意，往往如此。

在周晋的书出版之际，我略赘数语如上，读者幸留意焉。

陈 来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北京大学



本书获得北京大学上山出版基金资助

特此致谢

目 录

序 言	陈 来(1)
-----------	--------

上 编 二程与佛教

导 言	(3)
心迹第一	(8)
死生第二	(16)
性理第三	(24)
天人第四	(34)
觉悟第五	(40)
自然第六	(44)
定止第七	(49)
主敬第八	(55)

下 编 散论

唐宋学术转折与道学文化的兴起	(67)
读《有无之境》兼论《定性书》	(76)
用理性把握世界的起点	(86)
说禅	(102)
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简论	(114)
冯友兰先生小传	(127)
再谈冯友兰先生	(132)
冯道与钱谦益	(141)

附 录

程颐与道学文化的兴起·····	(149)
儒家心性哲学在北宋的展开(提纲)·····	(196)

上编 二 程 与 佛 教

导 言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中土之人始初以其不过神教之一种,故设祠祭其神以求福。及至魏晋,佛典渐渐翻译传入,佛学深旨,始得阐发。尤以玄学兴起,与大乘妙义互相发明,遂使中土之士人,进窥佛学之堂奥。隋唐之世,佛典经律论三藏大备,各宗竞起,胜义纷出,中土佛学,可称极盛。观佛教自传入至唐末近千年间,其法运之兴衰,往往系乎人主之好恶,如梁武好佛,则自奉其戒,舍身为僧;唐武灭法,则还俗其人,废毁其居。而佛学法理之阐扬,教义之发挥,则虽略受世运之影响,却仍能不断发展深入。

赵宋立国,北宋自太祖太宗以下,多亲佛教。太祖开雕大藏,遣僧西游;太宗度僧修塔,复译经院,且自制《新译三藏圣教序》;真宗尝作《崇释论》;仁宗则与大觉怀琏倡和佛法^[1]。然考北宋诸宗,皆非如前代帝王之佞佛者,其提倡佛教之本意,大略不过如太宗所谓“有裨政治”^[2]，“用福邦家”^[3]；真宗《崇释论》所谓“奉乃十力，辅滋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可以庇黎民而登仁寿也。”^[4]。故诸帝虽奉佛法，然对佛教之流行，仍加以控制。

太祖平定江南，“汰李氏时所度僧，十减六七。”^[5]太宗度僧，限额屡减，复严考试之制。《宋会要辑稿·道释一》载：“雍熙二年十月，诏天下应系二年所供帐有名者并许剃度。僧尼自今须读经及三百纸，差官考试，所业精熟方许系籍。……至道元年六月，诏江南两浙福建僧尼，今后以见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敕，比试念读经纸合格者方得以闻。……先是僧尼读经止以三百纸为限，而无念诵者，是岁太宗阅泉州僧籍已度数万余，籍未度者犹四千余，始定此制，明年又诏淮南川陕路并依此制。”其下引《锦绣万花谷》云：

“建隆初诏佛寺已废不得再兴，开宝中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岁度一人。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未）[者]四千人，已度万数。天子惊骇曰：‘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故立此制。”《宋会要辑稿·道释一》又载真宗时，大理评事张师锡上言，民有出家为僧者父母羸老无依，丐食他州，故天禧二年三月诏祖父母父母在别无子息侍养不得出家。

北宋之经济制度，亦对佛教甚少优待。寺院之田产，不得特许不能免税；^[6] 历来僧道免役，而王安石变法，乃令僧道皆出“助役钱”。至司马光元祐初废除新法，虽减助役钱，但寺观富庶者仍须出之。^[7] 且宋立官卖度牒之制，成为国用之重要来源。^[8]

由此种种原因，北宋人口逐渐增加，而《宋会要辑稿·道释一》记载之僧尼人数于真宗仁宗神宗三朝却逐渐减少。苏轼亦云：“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9]

然北宋之时，帝王奉法虽不如前代之甚，僧徒之数亦不如前代之多，其于政治之影响，亦不如前代之大，但佛教思想之传布天下，则于前代未尝多让。诸帝既倡之于上，而一时之名臣，士人所宗者，如杨亿、文彦博、富弼、王安石、赵忞、苏轼、宗泽诸人，皆信佛教；更遑论晁迥、张商英等著书立说以明之者。至于民间之拜佛烧香，佛礼治葬者，更是相沿成习。乃至若有人不用佛礼，则成为可注意之特例。如《宋史·穆修传》即特别记载穆修“母死，自负槨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饭浮屠为佛事。”

正于此种背景之下，乃有宋明道学之兴起。盖此时儒学面对佛教在思想上之挑战，已不能仅以政治、经济或民族上之批评以回应之，而必须就佛教所提出之理论问题，作出回答，并建立起自身之理论体系。道学之兴起，正为儒学之士欲发明孔门本有之义理，以抵御佛学思想之泛滥。故道学中人，多以排佛为己任，其文具在，历

历可见。然后学之人，亦有谓道学之思想，实来源于释氏者。其说于宋即有，而明清犹盛。如南宋叶适讥明道《定性书》出于佛老^[10]，明黄绾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11]佛门中人持此说者尤多，如明释宗本谓周张二程之学，尽从佛教而来。^[12]

儒门正统之士，自然多反对此说，然佛门中亦有持反对态度者，如明释元贤曰：“空谷隆作《尚直编》，中间谓，宋儒之学，皆出于禅。今诸儒之书具在，果得之于释乎？若谓诸儒之所得，即释氏之道，则非独不知儒，且自不知释矣……即谓其著述之语，间用内典，似得之于释，不知文同而理实迥别。若执此以为儒出于释，则释典用儒语为尤多，亦将谓释出于儒乎？”^[13]

数百年来，对此问题之讨论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大课题。争论双方所持之论据，有见于本人之文集，正史之本传者，亦有取之于野史杂记，真伪难辨者。然诸人皆各守己说，互相攻难，自宋至今，争论未休。

考北宋道学之巨子，首推周张二程，其中程氏兄弟二人，实为宋明道学之奠基者。如冯友兰先生即认为，明道为道学中心学一派之开启者，伊川为理学一派之开启者。^[14]本文拟就二程思想与佛教之关系，试作讨论。

程颢(公元1032—1085年)字伯淳，嘉祐二年进士，出任地方，所在皆有治迹。神宗熙宁二年由吕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寻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镇宁军节度判官，后迁数官，政迹卓然，复聚徒讲学。哲宗即位，召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终。后人称为明道先生。

程颐(公元1033—1107年)字正叔，嘉祐四年廷试未中，遂不复试，以读书讲学为务。元祐元年，入授崇政殿说书，以布衣而为帝师。二年八月，以洛蜀党争，为孔文仲所弹，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五年元月丁父忧，除服后未再出仕。绍圣间，以曾反对新法故，诏追毁

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后又编管涪州。徽宗即位，赦回洛阳复官。崇宁元年，被列入元祐党人籍，削官致仕。二年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有司觉察，复令尽逐学徒。遂嘱四方学者不必及门。大观元年病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

伊川作《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下引作《文集》）由是可知明道于佛教思想，有深入之研究，故《宋元学案》卷十四引高景逸语云：“先儒唯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

朱子作《伊川年谱》，未尝言伊川留心释氏，故后之学者，有以为伊川不读佛老者。如《宋元学案》卷十六引叶六桐语云：“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此语本《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称《遗书》）卷六弟子所记：“叔一生不曾看《庄》、《列》，非礼勿动勿视，出于天与，从幼小有如是才识。”《遗书》卷六，朱子以为有疑误不可晓处，其说甚是。此处言伊川不看《庄子》，而《遗书》中伊川与弟子讨论庄子其人其书处数见，可见其说之不确。且此处未言伊川不看佛书，《遗书》此卷甚至云“叔不排释老”。言伊川不排释老，自然不是，然谓伊川不看佛书，亦非确论。《遗书》卷三云：“先生（指伊川）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深浅，后来更不问。”且伊川之语录文集之中，涉及佛教之处甚多，其涉及之佛经，即包括《华严》、《净名》、《楞严》、《圆觉》、《坛经》等，而涉及禅宗语录灯录之处，更为多见。故谓伊川批评佛教则可，若谓伊川不读佛书，则断然不可。

知二程对佛教思想皆有深刻之了解，方可进而讨论二程思想与佛教之关系。